

近代“詩界革命”與黃遵憲的詩歌創作

霍 有 明

十九世紀末，伴隨著以“戊戌變法”為高潮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，在文學界也興起了一場包括“詩界革命”，“文界革命”和“小說界革命”在內的文學改革運動。這場“詩界革命”，是晚清詩歌陷入形式主義絕境的必然結果，是改良主義運動的需要，也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進一步發展。通常認為，“詩界革命”的口號是在1896至1897年間正式所提出，創始者則為夏曾佑和譚嗣同。其根據，主要是梁啟超的這段論述：“複生自喜其新學之詩。……蓋當時所謂‘新詩’者，頗喜摺扯新名詞以自表異。丙申（1896年），丁酉（1897年）間，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，提倡之者為夏穗卿（曾佑），而複生（譚嗣同）亦嗜嗜之。”①譚嗣同（1865—1898），字複生，號壯飛，湖南瀏陽人。他是戊戌變法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，又是一個比較激進的資產階級思想家，最後為維新事業獻出了生命。平生著述，今編為《譚嗣同全集》。夏曾佑（1861—1924），字穗卿，號別士，又號碎佛，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歷官禮部主事，祁門縣令，擢泗州知府，調權廣德。民國后，也參加過一些北洋政府的文史工作。有《夏曾佑詩集》。譚、夏等人，遭遇“古今奇變”，痛感國勢岌岌，遂力倡維新救國。他們提出“詩界革命”的主張，則完全出于推動變革的目的。譚嗣同在1894年為自己的詩集作“敘”時說：“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，猶不自懲，而為此無用之呻吟，抑何靡與！三十年前之精力，敵于所謂考據，詞章，垂垂盡矣。勉于世，無一當焉，憤而發篋，畢棄之。”②然而，究竟何為“新學”和“新學之詩”，在他們的思想上仍是朦朧的。在形式上，則“經生澀語，佛典語，歐洲語雜用”，所以“漸成七字之語錄，而不甚肖詩矣。”③試以譚嗣同《金陵聽說法》一詩為例：

而為上首普觀察，承佛威神說偈言。
一任法田賣人子，獨從性海救靈魂。
網倫慘以喀私德，法會盛于巴力門。
大地山河今領取，庵摩羅果掌中論。

“網倫慘以喀私德”一句，“喀私德”，是英語 Caste 的譯音，這是用來指印度封建社會中把人分為幾種等級的種姓制度。“網倫”，指封建的法統倫理。“法會盛于巴力門”一句，“巴力門”，是英語 Parliament 的譯音，指英國議會。“法會”，佛家語，指說法時的集會。作者從當時反封建的要求出發，傾慕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，故抨擊中國封建網倫而神往西方議會。“大地山河今領取，庵摩羅果掌中論”兩句，“庵摩羅”，佛家語，果名，據說似桃非桃，似柰非柰，生熟難分。佛語有“掌中庵摩羅果”成語。據《楞嚴經》：“阿那律見閻浮提（洲名，又名南瞻部洲），如視掌中庵摩羅果。”以喻一目瞭然。這種新派詩，基本上保持了舊體詩的形式格律，典故則取自佛、儒，基督三教經典，也摻雜了部分方言和外國語譯語，從而成為表達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哲學和政治觀點，宣傳科學思想的工具。就形式言雖稱之為“新學之詩”，實際上是“摺扯新名詞以自表異”，仍在舊詩學的窠臼裡面翻跟頭，沒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。

當時，作為“詩界革命”的實際中堅，在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方面都作出突出貢獻的，則要首推黃遵憲。

黃遵憲（1848—1905），字公度，號人境廬主人。別署東海公，法時尚任齋主人，水蒼雁紅館主人，布袋和尚，公之它等。廣東嘉應州（今梅縣）人。光緒二年丙子舉人。歷任日本國參贊，美國舊金山總領事，英國參贊，新加坡總領事及湖南按察使等。有《人境廬詩草》十一卷，《日本雜事詩》二卷。此外，尚撰有《日本國志》四十卷。

“窮途竟何事，餘事作詩人。”④黃遵憲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政治改革運動中的著名活動家，其平生抱負，並不在詩歌創作一途。然而，他一生的成就，卻主要體現在詩歌理論特別是創作方面。早在1868年，年甫及冠的黃遵憲在其《雜感》詩五首中即已明確提出了詩體改革的主張，其二有云：

大塊盤混沌，渾渾旋大圓；隸首不能算，知有幾萬年。羲，軒造書契，會始歲五千。
以我視後人，若居三代先。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紙研。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。古人棄糟粕，見之口流涎。沿習甘剽盜，妄造叢罪愆。黃土同搏人，今古何愚賢？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明窗敞流離，高爐爇香煙。左陳端溪硯，右列薛濤箋，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簡編，五千年後人，驚為古爛斑。

詩中譏笑“俗儒”尊古而不化，“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”；指出時代在不斷發展，因而語言也在不斷變化，“古”“今”則是相對而言。“以我視後人，若居三代先”，“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”從而提出“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”的創作主張，成為他新體詩創作的第一篇宣言，開“詩界革命”之先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所謂“我手寫我口”，不僅是從詩體語言的著眼點出發，更有強調詩中須有“我”在，詩歌之生命在於真實的意圖。這一創作主張，對清代詩壇上規模唐宋，模擬漢魏的復古之風可說是有力的批判。在《與朗山論詩》一文中，黃遵憲更指出：

夫聲成文謂之詩，天地之間，有聲皆有詩也。即市井之謾罵，兒女之嬉戲，婦姑之勃谿，皆有真意以行其間者，皆天地之至文也。不能率其真，而舍我以從人，而曰：吾漢，吾魏，吾六朝，吾唐，吾宋，無論其非也。即刻畫求似而得其形，肖則肖矣，而我則亡也。我已忘我，而吾心聲皆他人之聲，又烏有所謂詩者在耶！

在他看來，即使“市井之謾罵，兒女之嬉戲，婦姑之勃谿”，因有真意以行其間，故皆天地之至文。規唐宋模漢魏者，雖刻畫而得其形，仿效而肖其聲口，而“我”字則亡也。吾之“口”須道吾心聲，倘吾心聲皆前人之聲口，又豈有所謂詩者在耶。

1891年，黃遵憲在其詩集《人境廬詩草》編成后嘗自序云：

余年十五六，即學為詩。後以奔走四方，東西南北，馳驅少暇，幾幾束之高閣。然以篤好深嗜之故，亦每以餘事及之，雖一行作吏，未遽廢也。士生古人之後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，無慮百數十家。欲棄去古人之糟粕，而不為古人所束縛，誠戛戛乎其難。雖然，仆嘗以為詩之外有事，詩之中有人；今之世異于古，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？嘗于胸中設

一詩境：一曰複古人比興之體；一曰以單行之神，運排偶之體；一曰取〈離騷〉，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；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。其取材也：自群經三史，逮于周，秦諸子之書，許，鄭諸家之注，凡事名，物名切于今者，皆采取而假借之。其述事也，舉今日之官書會典，方言俗諺，以及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，耳目所歷，皆筆而書之。其煉格也：自曹，鮑，陶，謝，李，杜，韓，蘇，訖于晚近小家，不名一格，不專一體，要不失乎爲我之詩。誠如是，未必遽躋古人，其亦足以自立矣。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。〈詩〉有之曰：“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”聊書于此，以俟他日。

這篇自序，一向被看作黃遵憲詩歌理論之總綱。其基本觀點，則可大致分析如下：一，時代在變，社會生活在變，詩歌也要隨之變化。黃遵憲指出：“今之世異于古，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。”因此，在取材時，經，史，子書中凡事名，物名切于今者，皆可采取而假借之，從而推出新意。在述事時，凡今日之官書會典，方言俗諺，以及古人“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，耳目所歷”，則皆可筆而書之。黃遵憲曾有詩云：“海外偏留文字緣，新詩脫口每爭傳。草完明治維新史，吟到中華以外天。”^⑤黃遵憲正是以其實踐實現了其上述理論主張。二，詩歌要真實反映社會生活，詩歌要真實表現詩人感情。即所謂“詩之外有事，詩之中有人”。黃遵憲要求：詩歌創作須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事物，與此同時，又要真實地表達詩人的內心感受，並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評價，所謂既寫出“所遇之時，所歷之境，所思之人”，又寫出“所發之思”，從而達到“不先不後，有我在焉，前望古人，後望來者，無得與我爭之者”的理想境界。三，詩歌創作須努力開拓新境，更好地發揮其社會功能作用。1902年，黃遵憲在致邱焯葵的信中曾云：“少日喜爲詩，謬有別創詩界之論，然才力薄弱，終不克自踐其言。譬之西半球新國，弟不過獨立風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！若華盛頓，哲非遜，富蘭克林，不能不屬望于諸君子也。詩雖小道，然歐洲詩人，出其鼓吹文明之筆，竟有左右世界之力。仆老且病，無能爲役矣，執事其有意乎？”^⑥因此，他曾于胸中設一詩境：一爲“複古人比興之體”，即繼承詩，騷以來“比則蓄憤以斥言，興則環響以托諷”^⑦的優良創作傳統；一爲“以單行之神，運排偶之體”，即在律詩中運用單氣轉折，開合動蕩的方法；一爲“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”，即在五，七古長篇中借鑒韓愈等古文家“以文爲詩”的創作技法；一爲“取〈離騷〉，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”，即從精神上汲取其神髓，而不是從形式上因襲其面貌。前三點，側重點在于創作技巧，但亦涉及到創作方法。而後一點，則專在于強調從精神上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詩歌的優良傳統。這種觀點，與清代鄧輔綸，王闈運等人的擬古復古理論可說劃清了界限。四，詩歌創作須努力形成個人的創作風格。黃遵憲認爲，士今生古人之後，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不下百家。欲棄其糟粕，又不爲所困，確實很難。然而，倘能“自曹，鮑，陶，謝，李，杜，韓，蘇，訖于晚近小家，不主一格，不專一體”，廣泛學習，博采衆長，鍛煉而形成自己的風格，要不失爲“我之詩”。黃遵憲宣稱：今之人倘能作到以上所云諸點，雖未必遽躋古人，其亦足以自立矣。要言之，攀躋古人而創新自立，這就是黃遵憲詩歌理論的基本論點。通觀〈人境廬詩草〉，黃遵憲正是以其出色創作實踐了其理論主張，從而成爲“詩界革命”之第一人。

“詩界革命”，依照梁啟超的說法，是“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”；須“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”，而不是“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”^⑧。梁啟超還提出：“今日不作詩則已，若作詩，必爲詩界之哥倫布，瑪賽郎然后可。”而“欲爲詩界之哥倫布，瑪賽郎，不可不備三長：第一要新意境，第二要新語句，（第三）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，然后成其爲詩”^⑨。可見，在近代

史上其時的“詩界革命”，是要求詩歌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進行革新。正因為如此，梁啟超認為夏曾佑，譚嗣同兩人的新詩尚未臻佳境，而獨以為“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”，盛贊黃詩“元氣淋漓，卓然稱大家”^⑩。

1877年（光緒三年），黃遵憲作為清政府首批外交使節派赴日本，繼而轉派歐美，嗣魏源等“睜開眼睛看世界”後走向世界。海外形勝，奇景異態，新事新物，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，開拓了他的詩歌境界，“吟到中華以外天”，為其開創新派詩，表現新事物，熔鑄新理想，塑造新意境，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。

在黃遵憲筆下，終年積雪之富士山，天昏日暗之倫敦霧都，高聳入雲之巴黎鐵塔，力比禹功之蘇彝（伊）士運河，風和日麗之南洋海濱，舉凡足跡所歷之海外形勝，無不一一入詩。試觀其〈日本雜事詩〉中詠富士山之詩：

拔地摩天獨立高，蓮峰涌出海東濤。
二千五百年前雪，一白茫茫積未消。

再觀其詠櫻花之詩：

朝曦看到夕陽斜，流水游花鬥寶車。
宴罷紅雲歌絳雪，東皇第一愛櫻花。

櫻花為日本的國花。每年初春四月，和風一吹，無論城市，鄉村，公園，街道，到處都盛開著燦爛的櫻花，艷如紅雲絳雪。此時，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，皆出賞櫻花，宴飲于下，歌舞于下，可謂舉國如狂。黃遵憲的這首詩，正詠嘆了東瀛的這種奇風美景。1891年，黃遵憲調任駐新加坡總領事，離英赴任途經法國巴黎，游覽當時方竣工兩年餘的埃菲爾鐵塔，因有〈登巴黎鐵塔〉之作。詩前自序云：“塔高法國三百邁突（英文長度‘米’之譯音），當中國千尺。人力所造，五洲洲最高處也。”詩曰：

拔地岷然起，崢嶸矗百丈。自非假羽翼，孰能躡履上？高標懸金針，四維掛鐵網。下豎五丈旗，可容人千帳。石礎森開張，露闕屹相向。游人企足看，已驚眼界創。懸車倏上騰，乍聞轆轤響。人已不翼飛，迴出空虛上。並世無二尊，獨立絕依傍。即居最下層，高已莫能抗。蒼蒼複大圓，森芒裂萬象。呼吸通帝座，疑可通阍墜。自天下至地，俯察不復仰。但恨目力窮，更無外物障。離離盡方野，萬頃開沃壤。微茫一線遙，千里走河廣。宮闕與城壘，一氣作蒼莽。不辨牛馬人，沙虫紛擾攘。我從下界來，小大頓變相。未知天眼窺，么麼作何狀？北風冰海來，秋氣何颯爽！海西數點煙，英倫郁相望。緬昔百年役，裂地爭霸王。驅民入鋒鏑，傾國竭府帑。其后拿破侖，蓋世氣無兩。勝尊天單于，敗作降王長。歐洲古戰場，好勝不相讓。即今正六帝，各負天下壯。等是蠻觸爭，紛紛校得喪。嗟我稊米身，庭弱不自量。一覽天下小，五洲如在掌。既登絕頂高，更作凌風想。何時御氣游，乘球恣來往。扶搖九萬里，一笑吾其傲。

詩中通過對巴黎鐵塔的描述，表達了詩人對西方工業文明和人工偉力的贊美。而“懸車（電

梯)候上騰,乍聞轆轤響。人已不翼飛,迥出空虛上”,則更使詩人驚嘆“眼界創”。這種眼界的開創,不止于“宮闕與城壘,一氣作蒼莽”,“海西數點煙,英倫郁相望”的對歐洲西部景物的眺望,更有“一覽衆山小,五洲如在掌”的心胸之開張。試人登高望遠,由景緬史,縱論歐洲百年戰事,懷念當年一代英雄,不禁得出了“勝尊天單于,敗作降王長”的不易之論。這顯然是針對中國鴉片戰爭以來的被動挨打,賠款割地的現實而發,表露出詩人在世界背景下希望自己國家強盛的思想境界。與杜甫,高適等人登長安慈恩寺浮圖詩相較,不僅以新事物入詩(如電梯與氫氣球),而且還有時代,視野之不同。誠可謂“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”。其“蒼茫之氣,不減少陵,達夫〈登慈恩寺塔〉之作”①。

以新名詞,新事物入舊體詩,而不破壞其“舊風格”,或說中國古典詩歌的特有審美意境,是一件誠乎其難的事情。然而,黃遵憲的嘗試則可說取得了成功。如上述詩作〈登巴黎鐵塔〉中所詠之“電梯”及“輕(氫)氣球”,〈九月十一夜渡蘇彝(伊)士運河〉中所詠之“電燈”:“侵衣雪色添秋冷,繞檻燈光混月明。大漠經從沙磧度,雙輪徐碾海波平。”又如〈今別離〉四首中分詠火車,輪船,電報,照像及東西方晝夜相反的現象,用以表達別離之思念,堪稱以舊格調寫新事物的佳作。面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現實,黃遵憲還屢屢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體詩。如〈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〉:“嗚呼專制國,今既四千歲。豈謂及余身,竟能見國會。……人言廿世紀,無復容帝制。與世趨大同,度勢有必至。”又如〈紀事〉:“吁嗟華盛頓,及今百年矣。自樹獨立旗,不復受壓制。紅黃黑白種,一律平等視。人人得自由,萬物咸遂利。民智益發揚,國富及倍蓰。泱泱大國風,聞樂嘆觀止。”〈感事三首〉之三則曰:“哥倫比亞(哥倫布)尤人豪,搜索大地如追逃。……世人已識地球圓,更探增冰南北極。”“堂堂大國稱支那,文物久冠亞細亞。……宋時諸儒驚虛論,徒詡漢大夸皇華。謬言要荒不足論,烏知壤地交犬牙。鄂羅英法聯翩起,四鄰逼處環相伺。著鞭空讓他人先,臥榻一任旁側睡。古今事變奇至此,彼已不知寧勿恥!”皆情真而意切,抨擊專制,嚮往大同;放眼全球,疾呼警起,一發之于詩而不覺其“扞格”。

黃遵憲的詩歌中,還有大量詠懷時事,抒發反帝愛國思想的作品,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。這些作品,堪稱“詩之外有事,詩之中有人”,無愧詩史。如〈悲平壤〉,〈哀旅順〉,〈哭威海〉諸篇,即從詩題,詩人之于滿目時艱藉詩篇以抒悲憤之情便可見。又如〈度遼將軍歌〉,對吳大澂進行了辛辣的諷刺,把這位敗軍將領狂妄自大而又懦弱無能的表現刻畫得淋漓盡致。開端則云:“聞雞夜半投袂起,檄告東人我來矣。此行領取萬戶侯,豈謂區區不予畀。將軍慷慨來度遼,揮鞭躍馬夸人豪。平時搜集得漢印,今作將印懸在腰。”中寫其夸下海口乃云:“么麼鼠子乃敢爾,是何雞狗何虫豸?……能降免死跪此牌,敢抗顏行聊一試。待彼三戰三北餘,試我七縱七擒計。”尾寫其兩軍接戰時則云:“兩軍相接戰甫交,紛紛鳥獸空營逃。棄官脫劍無人惜,只幸腰間印未失。將軍終是察吏才,湘中一官複歸來。八千子弟半摧折,白衣迎拜悲風哀。幕僚步卒皆雲散,將軍歸來猶善飯。”真可謂莊,諧,悲,憤雜出。錢仲聯〈夢苕庵詩話〉評此云:“悲憤之思,出以突梯滑稽之筆,集中七古壓卷之作也。”再如〈馮將軍歌〉,熱情歌頌抗法愛國將領馮子材的英雄業績:“將軍一叱人馬驚,從而往者五千人。五千人衆排牆進,綿綿延延相擊應。轟雷巨炮欲發聲,既戟交胸刀在頸。敵軍披靡鼓聲死,萬頭竄竄紛如蟻。十蕩十決無當前,一日橫馳三百里。吁嗟乎,馬江一敗軍心懾,龍州拓地賊氛壓。閃閃龍旗天上翻,道,咸以來無此捷。得如將軍十數人,製梃能撻虎狼秦。能興滅國柔強鄰,嗚呼安得如將軍。”令讀者讀之亦感奮鼓舞。按詩人〈東溝行〉結尾有云:“人言船堅不如疾,有器無人終

委敵。”發明了武器並非制勝的唯一法寶，有器而“無人”，縱使船堅炮利也終究難以御敵的道理。在此作中，詩人則盼望更多如“子材”這樣的人材出現，“得如將軍十數人，製艇能撻虎狼秦”，“嗚呼安得如將軍。”表達了他憂國憂民，矢志圖強的心聲。

在一生的創作活動中，黃遵憲既能繼承中國古典詩歌的優良傳統，廣泛參照前代詩人的創作經驗，又能實踐自己別創詩界的一系列理論主張，而“不名一格，不專一體，要不失乎為我之詩”。丘逢甲〈人境虛詩草跋〉曾贊云：“四卷以前，為舊世界詩；四卷以後，乃為新世界詩。茫茫詩海，手辟新洲，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。……分體而論，則五律與四卷以前，可謂曰美。四卷后七古乃美而大；七絕大矣，而未盡化也，已大而化，其五古乎！七律乎！地球不壞，黃種不滅，詩教永存，有倡廟祀詩聖者，太牢之享，必有一席。”俞明震〈人境虛詩草跋〉則云：“公詩，七古沈博絕麗，然尚是古人門徑。五古具漢，魏人神髓，生出汪洋詼詭之情，是能于杜，韓外別創一絕大局面者。七律純用單氣轉折，又開一派，能多作，則妙境尚當層出不窮。集中此體，是開派之始，尚非大而化之之候。”劉燕勛〈人境虛詩草跋〉亦贊云：“讀君詩，無體不備，而五七古尤擅勝場。其音節之古，色澤之濃，氣格之高，非將〈離騷〉，漢，魏古樂府諸作，咬出汁漿，灌入肺腑，不能有此古艷，而于古詩則愈艷愈幽，愈幽愈古，作者不自知其然，伶工歌之，直可使梁塵作三日繞也。”今天看來，他各類詩歌中成就最大的當推五古。現僅舉其〈錫蘭島臥佛〉組詩為例。

在黃遵憲的五古中，〈錫蘭島臥佛〉組詩六首可稱扛鼎之作。全詩長達二千余言，從南洋諸島寫到錫蘭（今斯里蘭卡），由鄭和下西洋寫到蘇祿訪中國，由師子國之象口水寫到旃伽山之臥佛像，再由對臥佛像的描繪引出佛教的興盛遞傳，燈滅樹倒，由此生發出對世界幾大文明古國興廢無常的感慨，最終歸結為對中國這一亞洲四千年文明古國前途之擔心。其中對佛教教義的闡發，對宗教之爭和宗教與政治關係之述說，縱橫恣肆，博奧奇譎，舉凡中外故實，史乘佛典，一一征引，運于詩篇，實前所而未見。梁啟超評此詩云：“以文名名之，吾欲題為印度近史，欲題為佛教小史，欲題為地球宗教論，欲題為宗教政治關係說。然是詩也，非文也。有詩如此，中國文學界足以自豪也。”②茲引其組詩之六而論之：

噫嗟五大洲，立教幾教皇？惟佛能大仁，首先唱天堂。以我悲憫心，置人安樂鄉。古分十等人，貴賤如畫疆。惟佛具大勇，自棄銅輪王。衆生例平等，一律無低昂。罪畏末日審，報冀來世償。佛說有彌勒，福德莫可當。將來僧祇劫，普渡胥安康。此皆大德慧，傾海誰能量。古學水風火，今學聲氣光。辯才總無礙，博綜無不詳。獨惜說慈悲，未免過主張。臂稱窮鴿肉，身供餓虎糧。左手割利刃，右手塗檀香。冤親悉平等，善惡心皆忘。愈慈愈忍辱，轉令身羸瘠。獸蹄交鳥跡，一聽外物戕。人間多虎豹，天上無鳳凰。虎豹富筋力，故能恣強梁。鳳凰太文彩，毛羽易摧傷。惟強乃秉權，強權如金剛。吁嗟古名國，興廢殊無常。羅馬善法律，希臘工文章。開化首埃及，今亦歸淪亡。念我亞細亞，大國居中央。堯舜四千年，聖賢代相望。大哉孔子道，上繼皇哉唐。血氣悉尊親，聲名被八荒。到今四夷侵，盡撤諸邊防。天若祚中國，黃帝垂衣裳。浮海率三軍，載書使四方。王威鎮象主，鬼族馴狼狽。歸化獻赤土，頌德歌白狼。共尊天可汗，化外胥來航。遠及牛賀洲，鞭之如群羊。海無烈風作，地降甘露祥。人人仰震旦，誰侮黃種黃？弱供萬國役，治則天下強。明王久不作，四顧心茫茫。

開篇以“噫嗟五大洲，立教幾教皇”領起，從而對世界諸大宗教加以評析，又緊扣“錫蘭島臥佛”之詩題。“惟佛能大仁，首先唱天堂”兩句，氣勢奇崛，議論新穎，警動人心。“罪畏末日審，報冀來世償”。基督教的一種教義認為，現實世界充滿罪惡，不可能改善，終有一天最後毀滅，故稱為“末日”或“世界末日”。該教宣稱，耶穌將于“世界末日”審判一切死者和當時的生者，分別善人（指信仰基督者）和惡人（指不信仰基督者），善人升天堂，惡人下地獄。針對該說，詩人則宣稱：“佛說有彌勒，福德莫可當。將來僧祇劫，普渡胥安康。此皆大德慧，傾海誰能量。”至此，對佛教之揄揚可說已極。“獨惜說慈悲，未免過主張”兩句，陡然作轉，由此卻導出佛教之慈悲教義在現實中無法行得通的結論，議論迭生，令人心驚而目眩：“愈慈悲愈忍辱，轉令身羸廹。獸蹄交鳥跡，一聽外物狀。”人間多虎豹，是因為虎豹富筋力，故能夠恣意強梁；天上無鳳凰，是由于鳳凰太文彩，故毛羽易遭摧傷。從而揭示出當時強權政治橫行的世界局勢：“惟強乃秉權，強權如金剛。”這是詩人從國內現實和出使日、美、英諸國多年經歷中得出的一條痛苦的然而又不得不承認的結論。接下來，詩人又發出世界幾大文明古國興廢無常的感慨：“羅馬善法律，希臘工文章。開化首埃及，今亦歸淪亡。”由此歸結到對中國這一四千年文明古國前途的擔心：“念我亞細亞，大國居中央。堯舜四千年，聖賢代相望。大哉孔子道，上繼皇哉唐。……到今四夷侵，盡撤諸邊防。”最終抒發出“天若祚中國”這樣的殷切期望，憧憬“人人仰震且，誰侮黃種黃？”的強盛局面的出現。接下兩句：“弱供萬國役，治則天下強”，則更大聲疾呼，再次點明和強調本詩之旨，吶喊出時代之強音，使全詩達到高潮。然而，這一切，只不過是詩人的一種幻想，建立在“天若祚中國”這樣的基礎之上，眼前的現實，卻是封建統治階級昏庸腐敗，不斷割地賠款的嚴酷局面，“如何斂手退，一任敵橫縱？竟使清淨土，概變腥膻戎。”（〈錫蘭島臥佛〉組詩六首之四）“婆羅左右望，群島比蟻虱，咸歸西道主，盡拔漢赤幟。日夕興亡淚，多于海水滴。”（同上之一）詩人的理想，遂忽然一下又回到現實：“明王久不作，四顧心茫茫。”剛才高唱入雲的歡欣，頓時變為低回婉轉的感傷。強烈的轉折，強烈的對比，益現出詩人之悲，余音旋繞而不絕如縷。通觀全詩，大開大合而大氣盤旋，議論風生而絲絲入扣，真可謂“從議論中迸出光焰萬丈”^⑬。嚴複于1898年首譯赫胥黎〈天演論〉，以“物競”“天擇”概括達爾文學說之基本精神，更將“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”的思想提升到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共同規律的高度，認為世界在不斷進步，中國如不奮發圖強，除舊布新，必將難以自存于世界。黃遵憲在“戊戌變法”後所補作的這一五古大篇中，則同樣宣傳這一思想，內雖有“天朝大國”思想的歷史局限，但發明“惟強乃秉權，強權如金剛”的世界強權政治橫行的局勢，向往“人人仰震且，誰侮黃種黃？”的中國強盛局面的出現，大聲疾呼“弱供萬國役，治則天下強”的“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”的“天演”規律，無疑有著振聾發聵的時代意義。志士仁人讀之，當亦“若受電然”^⑭。

還值得注重的是，從其別創詩界的詩歌理論出發，黃遵憲還注重向民間文藝學習，並嘗試在詩歌中加以探索。應當說，這也是他在“詩界革命”中摸索詩歌新體式所作出的一種努力。試觀其早年所作九首〈山歌〉之前四：

自煮蓮羹切藕絲，待郎歸來慰郎飢。為貪別處雙雙箸，只怕心中忘卻匙。
人人要結後生緣，儂只今生結目前。一十二時不離別，郎行郎坐總隨肩。
買梨莫買蜂咬梨，心中有病沒人知。因為分梨故親切，誰知親切轉傷離。
催人出門雞亂啼，送人離別水東西。挽水西流想無法，從今不養五更雞。

這組山歌，是黃遵憲在輯錄客家鄉歌基礎上加工而成。詩風清新活潑，又多用同音構成的雙關隱語而抒情，令人一新耳目。聯想到當時規唐模宋的復古詩風正流行詩壇，則尤覺不易。在他44歲出任駐英參贊時，黃遵憲又續寫有〈山歌〉六首，其題記云：

十五國風妙絕古今，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，使學士大夫操筆爲之，反不能爾。以人籟易爲，天籟難學也。余離家日久，鄉音漸忘，輯錄此歌謠，往往搜索枯腸，半日不成一字，因念彼岡頭谿尾，肩挑一擔，竟日往復，歌聲不歇者，何其才之大也！

這種對勞動人民口頭文學的贊賞和向往，與清中期進步詩論家袁枚的見解則頗爲相似。按，袁枚詩中嘗有“我不覓詩詩覓我，始知天籟本天然”之句。在他看來，作爲審美主體，當詩人的內心世界與作爲審美客體的大自然契合及感應時，興會所至，眼前之景，當時之情，不覺發而爲詩，絕無雕琢，得自然之真趣，這便是天籟之鳴。所謂“亦有生金，一鑄而定”^⑮，即當指此。袁枚甚至認爲：“口頭語，說得出便是天籟”^⑯，並且稱贊說：“十五〈國風〉，則皆勞人，思婦，靜女，狡童矢口而成者也”^⑰。因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很注意虛心聽取。他曾說：“少陵云：‘多師是我師。’非止可師之人而師之也。村童，牧豎，一言一笑，皆吾之師，善取之皆成佳句。隨園擔糞者，十月中，在梅樹下喜報云：‘有一身花矣！’余因有句云：‘月映竹成千‘个’字，霜高梅孕一身花。’余二月出門，有野僧送行，曰：‘可惜園中梅花盛開，公帶不去！’，余因有句云：‘只憐香雪梅千樹，不得隨身帶上船。’”^⑱應當說，黃氏的這種觀點，也正是古代優秀作家從民間文學中吸取營養的傳統精神的繼承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黃遵憲並非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完人。他畢竟是一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，其根本立場在於維護封建統治，因而鼓吹“君主立憲”；對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和團運動，則都採取仇視的態度。他的詩歌內容，不能不帶有較大的局限性。同時，他也沒有（實際也不可能）堅持在詩歌創作中貫徹“我手寫我口”的主張，在衆多詩篇中時而堆砌典故，造成藝術成就上的明顯缺陷。

儘管如此，黃遵憲在近代詩壇上仍無愧爲大家。長期以來，作爲“詩界革命”之“哥倫布”，他的開創和探索，受到衆多論者的稱譽。但與此同時，亦受到不少論者的詬病。譽者如康有爲云：“（黃詩）上感國變，中傷種族，下哀生民，博以寰球之游歷，浩渺肆恣，感激豪宕，情深而意遠，益動于自然，而華嚴隨現矣。公度豈詩人哉！而家父，凡伯，蘇武，李陵及李，杜，韓，蘇諸巨子，孰非以磊砢英絕之才郁積勃發而爲詩人者耶？公度之詩乎，亦如磊砢千丈松，郁郁青蔥，蔭岩竦壑，千歲不死，上蔭白雲，下聽流泉，而爲人所瞻仰徘徊者也。康有爲序于那威北冰海七十二度觀日不沒處，以爲公度有詩，猶不沒也。”^⑲貶者如胡先驕云：“黃公度……之詩，大氣磅礴則有之，然過欠剪裁，瑕累百出，殊未足稱元氣淋漓也。”^⑳徐英甚至認爲，黃詩“謬戾乖張，丑怪已極。”^㉑錢鍾書亦有云：“近人論詩界維新，必推黃公度。〈人境廬詩〉奇才大句，自爲作手，五古議論縱橫，近隨園，甌北，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鐵雲，七絕則翼定庵，取徑實不甚高，語工而格卑，愴氣尚存，每成俗艷。尹師魯論王勝之文曰‘瞻而不流’，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。大膽爲文處，亦無以過其鄉宋芷灣。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，掩揅聲光電化諸學，以爲點綴；而于西人風雅之妙，心性之微，實少解會。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，譬如〈番客篇〉，不過胡稚威〈海賈詩〉；〈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〉，不過〈淮南子倣真訓〉所謂‘槐榆與橘柚，合而爲兄弟。有苗與三危，通而爲一家’，查初白〈菊瓶插梅〉

詩所謂‘高士累朝多合傳，佳人絕代少同時’，公度生于海通之世，不曰‘有苗三危通一家’，而曰‘黃白黑種同一國’耳。”^⑫上述評語，均未免過分苛求于古人，貶之過甚。錢仲聯曾指出：“予以爲論公度詩，當著眼大處，不當于小節處作吹毛之求。其天骨開張，大氣包舉者，真能于古人外獨闢町畦。撫時感事之作，悲壯激越，傳之他年，足當詩史。至論功力之深淺，則晚清做宋人一派，儘有勝之者。公度之長處，固不在此也。”^⑬此論洵爲的評。

注：

- ① 見梁啓超〈飲冰室詩話〉第六十則。
- ② 見譚嗣同〈莽蒼齋詩自敘〉。
- ③ 梁啓超〈夏威夷游記〉，見〈飲冰室專集〉二十二。
- ④ 黃遵憲〈支離〉詩，見〈人境廬詩草〉卷八。
- ⑤ 黃遵憲〈奉命爲美國三富崗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〉詩。
- ⑥ 見〈小說月報〉第八卷第一號。
- ⑦ 〈文心雕龍·比興〉。
- ⑧ 〈飲冰室詩話〉。
- ⑨ 〈夏威夷游記〉。
- ⑩ 〈清代學術概論〉，見朱維錚〈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〉第83頁。
- ⑪ 見錢仲聯〈夢苕盦詩話〉。
- ⑫ 〈飲冰室詩話〉。
- ⑬ 袁枚評趙翼〈和友人洛陽懷古四首〉之語，此借用之。
- ⑭ 見梁啓超評龔自珍語：“晚清思想之解放，自珍確與有功焉，……初讀〈定盦文集〉，若受電然。”（〈清代學術概論〉二二）
- ⑮ 見袁枚〈續詩品·勇改〉。
- ⑯ 〈隨園詩話補遺〉卷二。
- ⑰ 〈隨園詩話〉卷三。
- ⑱ 〈隨園詩話〉卷二。
- ⑲ 〈人境廬詩草序〉。
- ⑳ 見胡先驌〈讀鄭子尹〈巢經巢詩集〉〉。
- ㉑ 見徐英〈論近代國學〉，轉引自郭庭禮著〈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〉第二卷第811頁，中國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。
- ㉒ 見錢鍾書〈談藝錄〉。
- ㉓ 〈夢苕盦詩話〉。